

何兆武自述

我原籍湖南岳阳，1921 年 9 月生于北京。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时就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高中一年级；9 月全家间道南返故乡，在长沙入中央大学附中（由南京迁校）；1939 年毕业，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1946 年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研究生。1946—1949 年任台湾建国中学、湖南第十一中学教师，1949—1950 年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毕业，1950—1952 年北京图书馆编目员，1952—1956 年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1956—1986 年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 年后任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1980 年曾兼任中美文化交流委员会中方访问美国学者，1984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鲁斯基金访问教授，1986—198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93—1994 年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1995 年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我自己幼儿时正值军阀混战，但北洋时期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和后来的国民党时期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印象至今难忘。其后做小学生时又值北伐和九一八，九一八以后无日不在危城之中。上中学时，全民抗日战争爆发，随后是不断的颠沛流离。上大学时是欧战，继而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读

研究生时，二战结束。或许是由于自幼在古老的北京城里生活所培育的思古之幽情和连年战乱所引发的对人类历史和命运的感触和思索，使我选择了历史作为专业。

求学时期许多师友的启发和虽在战时却仍然相当丰富的图书与便利的阅读条件，容许我经历了相当长一段难忘的时光。在物质生活极其艰苦之时，却往往能得到精神上无比的启蒙之乐。当时的校园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它给了学生们很大的自由度，可以自由转系、自由旁听，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的同学共同生活在一起。我自己曾前后转过四个系，曾旁听过吴宓先生的欧洲文学史和文学与人生，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张奚若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和近代西洋政治思想史，刘文典先生的温李诗，冯至先生的浮士德，汤用彤先生的大陆理性主义和其他的课程和讲演；这些都不是我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同学好友中王浩和郑林生都曾对我的思想有过很大的影响。他们的专业我虽然一窍不通，但他们的谈话和思路每每给我以极大的启发。在专业上，葛邦福老师（J. J. Gapanovitch）则是引导我对历史哲学感兴趣的指路人。

解放后自 50 年代至 80 年代我参加了侯外庐先生领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班子，作为他的助手工作了三十年。我以为侯先生的最大优点和特点是决不把思想史讲成是思想本身独立的历史，即不是从思想到思想而是把思想首先当成是现实生活的产物，然后才是它从前人的思想储备库中汲取某些资料、方法和智慧。这本来也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之所在，即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然而 60 年代所风行的观点却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专门强调思想领先，把事情说成是思想在决定一切的存在，历史是沿着思想所开辟的航道前进的。当时各种运动、劳动、社会活动和不务正业的各种业务连接不断，

几乎占去了一个人绝大部分的时间，自己的专业也就无从谈起。

因为对西方思想史也甚感兴趣，所以不时也偷暇翻阅一些，这在当时是被认为自留地或是地下工厂的。偶然得到了Halbwachs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注释本。卢梭的书已是西方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曾大有影响，而居然没有一个可读的中译本，更不用说注释本。于是我又找来几种名家的注释本和 Vaughan 的权威本，除了翻译本文之外，还做了些集注的工作，多年来已前后修订过三次。

近代西方思想史，我以为实际上是两大主潮的互相颉颃，一条是由笛卡尔所开辟的“以脑思维”的路线，另一条是由巴思迦所开辟的“以心思维”的路线。后一条路线并不违反科学，巴思迦本人就是近代最杰出的数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但我国的研究者几乎从不提及巴思迦的名字。我恰好有一本Brunschvicg （巴思迦）的权威本，所以又偷译了他的《思想录》，并找了几种注释本，也做了一点集注和诠释的工作。在我感兴趣的历史哲学领域，我以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一书，迄今仍不失为西方最深刻、最有价值的著作，所以斗胆在“文革”期间备尝艰苦地把它译了出来。以后又译过几部书，大都是由于偶然，兴之所至，自己选译的。但其间有两部书是当事人来找我译出的。一部是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思想史》，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找到了我，当然是由于我在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的缘故。另一部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的遭遇则颇有点戏剧性了。

50年代罗素曾起劲地大搞和平运动，颇受我国当局的赏识。因此毛和周联名电邀罗素来华访问，罗素亦已欣然同意，但临行时，高龄已九十有余的罗素因身体原因，不克远行。罗

素乃以他的《西方哲学史》一书赠毛，毛遂转交下面译出。当时这类书籍是由商务印书馆分工出版的，商务印书馆便找到了我。（这事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编骆静兰学姐亲口告我的。）我虽也有兴趣，但嫌全书过长，译完第一部分之后，便辞掉此事。“文革”中，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驻之后，批斗我的罪状之一就是，我翻译此书是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招魂。以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之权威竟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本人，可谓开万国亘古未有之奇，使我只敢窃笑而不敢明言。

“文革”以后，时间较多，研究环境也较前宽松，几次出国，也接触到了一些过去未能见到的书和材料，于是又动手翻译了几部书，也写了一些文章。文章大多已收入自己的书中和文集中。近代中国较近代西方落后了一步，所以 19、20 世纪的中国还在补西方 18、19 世纪的课。把历史学认同于科学，就是在思想上补 19 世纪实证主义的课。我以为历史学既有其科学的一面（所以它必须服从科学而不能反科学），又有非科学的一面（所以就不能以实验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要求为尽历史学之能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历史学（和人文学科）还另有其自己独特的纪律、规范和准绳（criterion）。我希望有人能把它写出来，我自己也愿意做一点抛砖引玉的工作。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活动，所以研究人性运动的轨迹（即历史）就是历史学的当然任务。人性当然包括阶级性在内，但阶级性并不能穷尽人性。善意固然是人性，恶意也是人性——例如除了人这个物种而外还有哪种动物是以虐待自己的同类为乐的？“文革”对于其他专业工作者未免是一种损失，使他们失去了大量宝贵的钻研时间；但是惟独对于文科来说（如历史学、哲学、文学等），它却也是一次无比的收获，它使得我们有千载难逢的机会去体验到人性的深处，这是任何太平盛世所

梦想不到、求之不得的机会。几千年全部的中国历史和在历史中所形成的人性，都以最浓缩的形式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迸发出来。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不能运用这样空前（或许也绝后）的优异条件写出一部或若干部的“文革”史、中国史乃至世界史、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书来，那就未免太辜负自己所经历的时代了。

著作：《中国思想发展史》（合作）、“An Intellectual Histony of China”、《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近代西方思潮》、《苇草集》、《学术文化随笔》。

参加侯外庐先生主编下列各书的撰写工作《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国哲学简史》、《中国近代哲学史》、《宋明理学史》、《中国思想史纲》。

编纂及校订：侯外庐《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马克思《读罗马尼亚史手稿》、《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王重民《徐光启》、利玛窦《中国札记》、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赫德逊《欧洲与中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1946 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七卷“历史哲学”）。李泽厚《Discounse on Zhuang Zi and Chan Buddhism》。

翻译：库尼茨基《太阳系结构学说发展简史》、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社会契约论》、罗素《哲学问题》、《西方哲学史》、《论历史》、帕斯卡尔《思想录》、《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李约瑟《中国科学思想史》、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康德《永久和平论》、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梅纳克《德国的浩劫》、盖伦《科技时代的心灵》、狄百瑞《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伊格尔斯《二十世纪

的历史科学》、柏克《法国革命论》、劳拉·费米《费米传》、孔多赛《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贝克尔《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近代西方史学理论选》、《人类的故事》、房龙《人类思想解放史话》。

论文、杂文及译文若干篇。

1998 年



江地自述

江地，原名李广澎，现在的名字是原来的笔名，山西省沁水县中村人， 1921 年 9 月 19 日生。现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学历的人，仅在抗日战争前夕，读过一年半初中就失学了，再没有机会深造，只好去当教师，借以糊口维持生活。我曾经当过五年小学教师，十年中学教师，1956 年到大学教书，如今也已二十八年了。教书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所谓教学相长，即是此意，而且必须学懂教好，不然就会在课堂上出丑，这样年年月月地边学边干，边干边学，文化水平就慢慢提高了。小学我从四年级教起，教完了一年，看看五年级的课程也可以教了，就去教五年级，然后是六年级，再然后是教中学。教中学也是从初中一年级教起，然后再教二年级，三年级，这样循序渐进，比较有把握，比越级而教的办法稳妥，就这样一步一个台阶，又从大学一年级教到四年级，然后再给研究生讲专题课，培养硕士研究生。我因为是从中学调到大学教书的，没有当过助教，却当过讲师、副教授，再当教授。这种办法，对于今日的青年教师，并不完全适用，但学习应该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却是具有共同性的。这对于那些想通过自学途径，来进入专业领域的同志们来说，也许是可以参考的。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我的家乡一个中学里教书。这里是老解放区，是战争环境，一切是为了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区内部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在这期间，我一边教书，一边也给干部讲理论课，讲过哲学，讲过经典著作，也讲过政治经济学。我也参加土改，也动员参军，工作忙碌，严肃而愉快。在这种环境中工作了三四年，老解放区的人民教育了我，使我有了一点革命斗争的实践，理论上也打了一点基础，这对于后来研究学问，分析问题，是有很大好处的。那时候年轻，政治热情很高，为了把工作尽可能做得好一些，便努力学习，当时并没想到做学问，可以说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学习的。1948 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石家庄，这是我们解放大城市的开始，我们都欢天喜地，知道离全中国的解放，日子不会太远了。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有一位领导同志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大意是：全国快要解放了，过去我们学会了打仗，但打仗的事情快要过去了，过去我们是在农村根据地，但今后我们面临着的新任务，是要学会管理城市，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过去了，而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个指示对我影响不小，应该熟悉一门专业和搞好专业的愿望，在心里隐隐约约地产生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 年，我和许多同志一样，由农村进入了城市，但我的工作性质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在一个中学里教书。教过语文，也教过历史和政治，后来主要是教历史。这时，我教的是高中中国近代史，使用的课本是宋云彬先生编写的，那是他在解放前出版的，因为建国伊始，一切都得从头开始，而急切之中还编不出课本来，便由教育部指定，暂以此书为代用课本。这部书作为著作是一回事，但作为课本就很不适用，使用起来很别扭，我感到很大的困难。于是，只好

自己写讲义，边写边教，于是就产生了编写一部高中中国近代史课本的想法，还想把它编好。但是，由于我的水平太低，根本不知道著述之道是怎么一回事，也不会使用参考书，不知道安排、组织与剪裁，只是凭着一股子热情往下写。我是以范文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为蓝本，但却基本上把范著照抄了一遍，一个学期结束，我也把讲义写完了，写了三十多万字，这个工作没有成功，没有编成什么课本，只是一堆草稿而已，但它却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眼过十遍不抵手过一遍，经此认真抄写一遍，把中国近代史搞熟了，在专业上有了一定的基础，在课堂上讲起来，不像过去那样讲得干巴巴了。

接着下一个年度，学校叫我教中国现代史，这时已有了课本，可也并不理想，何干之同志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当时还没有出版，只有胡华同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可以参考。我已经初步尝到了编写讲义的甜头，于是，我又如法炮制起来，说是以胡华同志的著作为蓝本，实际上也是大部分照抄他的书，并适当地参考了一些当时所能找到的其他的参考书。这样一来，一个学期结束了，我又写了二十多万字的中国现代史讲义，正如前面所说的，我还是不知道怎样编写讲义，也还是不知道怎样著书，依然是大部分照抄了一遍，课本仍然没有写成，但却比较好地打下了中国现代史的基础知识。现在回想起来还很后悔，未能把中国古代史也照样地抄它一遍，倘能抄它四五十万字，中国古代史的基础也就奠定了。一直到现在，凡是讨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问题，凡是需要写这方面的文章，我马上就可以着手进行，而对中国古代史的文章，就顾虑较多，不敢轻易下笔，就是因为当年没有把这一门课程的基础打好之故，这是很可惜的，这也是一个教训。

我当时想编写课本的决心很大，在这一次尝试失败以后，

并没有就此而止，而是在 1952 年的春天，又重新开始了，我就又开始编写我理想中的中国近代史课本，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这一次学得比较聪明了，就是懂得了要抄诸家之书而不抄一家之言，再也不能光照一本书办事了，而应该找到尽可能多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根据各家之书来编写我的课本，比如编写鸦片战争这一部分吧，就把各家书中有关鸦片战争的部分，全部打开来读，全部读过以后，你就知道那家在某些方面写得好，而在其他方面就不如另一家写得好，这样取其长而避其短，补其阙而删其冗，就好像制造产品一样，用它们作原料，慢慢融合剪裁，写出有关的章节来。这一次就比以前的办法进步了。就这样，我写完了鸦片战争部分以后，接着写太平天国部分，在中国近代史中，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所占比重较大，我自然也就钻研得比较深入。在编写过程中，我不但逐步发现了许多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以及太平天国史的著作，而且知道了罗尔纲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就把他的著作找来读,并且找到了像《清史稿》、《东华录》等书中有关部分来读，这样我的视野扩大了，读的书多起来了，不但读了有关的著作，而且初步接触到一些原始资料，对线装书发生了兴趣。为此我专门到北京走了一趟，为学校买回来过去作为一个中学的图书馆所没有过的《清史稿》、《东华录》、《清代通史》等书籍。在研究过程中，自己感到兴味越来越浓，太平天国史上悲壮慷慨可歌可泣的事件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就这样深入地编写下去，这次收获较大，可惜我的课本编写计划还是失败了。因为我深入下去了，写的字数又太多了，比重不能平衡，不相适应，还是掌握不了编写教科书的具体要求，但我顾不得它了，极大的兴味使我不顾一切地边读边写下去，仅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这两部分，我又写了差不多二十万字的草稿。

在太平天国史的编写将要结束的时候，一般著作里都有那么一小节，要讲到捻军起义和天地会起义。那时候，这两次起义都是作为太平天国史的附庸而存在的，仅仅在有关章节中稍稍提一下就过去了，没有人重视过它。我在编写过程中，对“捻军”的“捻”字发生了兴趣，为什么过去都叫黄巢、李自成或张献忠起义，或叫太平天国革命，即有的是以其领袖命名，有的是以其国号相称，这都容易理解，而捻军却不是如此，这就不容易理解了。我翻了几家的著作，有的说是“群聚为捻”，有的说是“聚众打降为捻”，有的说是“乡民行傩逐疫，裹纸燃膏为龙戏谓之捻”（王定安《湘军记》卷十六平捻篇）。因为说法不一，总是弄不清楚。而且，各家之书凡是到了捻军这一部分，大都匆匆而过，讲得很少，只有华岗同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太平天国部分（这一部分，曾以《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的名义，单独成册出版），讲得略多一些，但也不过三千多字，而且有许多问题也没有说清楚。因此，当时我就暗暗下了一个决心，要把捻军这个问题专门探讨一下，要写得详细一些，于是，我就把许多著作中有关的这一部分收拢到一起，按年月日编纂起来，尽量加以扩充，使之加深加详，这样很快写成了一个大约两万多字的有关捻军起义的专门章节，心里颇为得意，心想我的课本倘若将来编成出版，起码在捻军这一部分比诸家之书都要详细而系统一些，就在这个初稿刚刚写成之际，由范文澜、翦伯赞等同志编写的《捻军》资料六大册，在 1953 年的 4 月出版了，这对于我说来，真正是如获至宝，我马上把这套书借回来，就原稿重新编写和扩充。这时候，我已经学会了怎样运用原始资料，来扩充这个初稿的办法，主要就是把历史事实从原始资料中钩稽出来，然后用年经事纬的办法串联起来，我已经认识到年代学对于治史

者的重要性，几部有关检查年代的工具书，已经常常置之身边备用。在这个基础上，后来我又找到了陈垣先生的《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进一步地钻研起年代学来，又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把历史事实串联起来，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要进行理论分析，要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加以论断和评述的问题，这是要和对原始资料的钩稽与编排同时进行的，这就是理论与专业的结合，在史学界叫做“以论带史”或“论从史出”，这也在实践过程中慢慢学会了。这项工作进行得很快，几个月之后，我又编写出近十万字的捻军史稿件，很显然，这与原定的课本编写计划远远脱离开了。在课本中平衡字数，捻军是连两万字也用不了的，怎么会容纳十万字呢？加上我从前所写的讲义，这时候已经达到了七八十万字了，稿件在桌子上越积越高，可是，课本究竟应该怎么个编法，论文究竟应该怎么个写法，历史研究究竟应该怎样进行，这对于我来说还是一笔糊涂账，我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啊！墨水一瓶一瓶地写完了，稿纸一本一本地用完了，神经衰弱在加剧，身体一天一天地消瘦下去，周围的冷嘲热讽也不少，什么不安心工作呀，什么想成名成家呀等等的话，都使我神情憔悴，心力交疲，这在大学里工作还有压力，何况是在一个中学呢，那压力就更大了。一些好心的同志也怀疑这种做法，他们劝我就此而止，趁此收摊算了，教教书不很好吗，何必自找苦吃呢！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有一段话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段，‘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同叔：《蝶恋花》）比第一阶段也。‘衣带惭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蝶恋花》）此第二阶段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阶

段也。未有未阅第一第二阶段，而能踞跻第三阶段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当时，这第三阶段我还没有达到，所以也体会不了，但这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心情，确切地是感觉到了，真正是史海茫茫，何处是岸啊！

我既不是要成大学问，也不是要成大事业，仅仅是想作一点学问，想学习一点东西而已，可就为什么这么困难，实在是学然后知困。我想，这样一直盲目地干下去不是办法，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怎么办。当时，捻军史的编写，已经到了 1863 年（同治二年），即初期捻军战争结束，后期捻军即将开始之际，这部分史实比较完整而生动，我想不如先把这小部分整理成一篇文章，先向史学家请教一下再说。于是，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这一小部分写好，经过反复琢磨，写成了一篇约八千五百字的文章，自己加了个题目，叫做《皖北根据地失守和张洛(乐)行殉难》,副标题叫做《捻军小史的一节》。写成以后，我寄给了《光明日报》的《史学》副刊。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史学》双周刊,是由《光明日报》委托邓广铭,荣孟源和周一良三位学者共同负责的，邓先生负责中国古代史，荣先生负责中国近代史，周先生负责世界史，稿件的取舍是由他们决定的。在荣先生的主持下，稿件寄出不过两三个星期就见报了，这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 1953 年 8 月 8 日的《史学》上，它占去了整个版面的大部分篇幅，在经过长期的苦苦摸索之后，犹如豁然贯通，骤见光明一样，这对于一个正在治学的青年来说，实在是很大的鼓舞，我的劳动总算没有白费而开始有了一点成果，这就是我的第一篇处女作，它后来成为拙作《捻军史初探》中的第一篇。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中踏出第一步是困难的，但既经踏出之后，就可以顽强地坚毅不拔地走下去了。这

篇文章的发表给我最大的一个好处是：我从此吃了一颗定心丸，我终于摸到了写作历史论文的门径。继此之后，我更加努力了，不过两个星期，我的第二篇论文《论太平天国西北战争》（见《捻军史论丛》,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又写成了，又寄出去了。此后接着又相继写出了《论后期捻军战争》、《论东捻军的抗清斗争》、《论西捻军的抗清斗争》等文。 1954 年冬天，在《历史研究》的第五期上，发表了《论东捻军的抗清斗争》一文，全文两万字。当时刘大年同志在主编这个刊物，他在事先给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你在中学教课繁忙的任务中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也不容易，我们将在某期发表它。这封用毛笔写的信，我一直珍藏着，到了“ 文化大革命 ”开始以后，才恋恋不舍地把它烧掉了。在这些文章陆续发表的同时，我把它集中起来，大约有九万字，请三联书店编辑部看看它能否出版，而三联书店在 1956 年出版了拙作《捻军史初探》，到 1959 年又出版了拙作《初期捻军史论丛》，三联书店编辑部的同志们是无名英雄，他们的审稿工作相当认真。他们认为书稿已经达到一定水平时，就决然地出版了它。 1963 年，在黎澍同志主编的《历史研究》的第三期上，又发表了我的二万七千字的《论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关系》一文。对于这些史学界的前辈以及和我同辈而却远远高出于我的那些同志们，我一直怀着感谢的心情，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也许就会永无出头之日。在我们的年轻人中间，也确实有一些人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帮助，而终于没有能够冒出尖来，他们的作品没有能够发表出来，他们的创作热情被扼杀了，这样的人我知道确实是有的。我认为一件事情的成功，主观条件反映了自己的努力，但如果没有客观条件的具备，那是什么也办不成的，从这方面来说，还是客观条件决定主观愿望的。

经过这些年的研究以后，捻军史方面发表了几十篇论文，编成了五本书，已经出版了三本，还有两本尚待出版，计划编写的也还有两种。除此之外，还和别人合作写成了几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并发表了不属于这个范围的论文数十篇。这里先把五本捻军史的书介绍于下：

（一）《捻军史初探》，由三联书店于 1956 年出版，约九万字，除少数几篇外，它是关于捻军后期历史的探讨，从 1863 年（同治二年）初期捻军战争结束，到 1868 年（同治七年）的捻军战争失败。

（二）《初期捻军史论丛》，由三联书店于 1959 年出版，约十八万字，除少数几篇外，这是关于捻军初期历史的探讨，从 1851 年（咸丰元年）捻军起义的产生，到 1863 年初期捻军的失败。

（三）把以上二书合并，并作了适当的增删改补，书名改为《捻军史论丛》，由人民出版社于 1981 年出版，约三十万字，除少数几篇外，这是一部以论文形式写成的捻军史，它探讨了捻军起义的产生、发展和败灭的全过程。

（四）以上三书是从纵的方面来研究捻军起义的产生、发展与败灭的过程，而这第四本书则是从横的方面探讨了有关捻军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其中主要的如关于捻军和太平天国的关系问题，关于捻军和地方农民起义军的关系问题，关于捻军史的分期问题，关于捻军起义的作战方法问题，关于捻军史的调查问题，关于捻军史的资料问题等，书名就叫《捻军史研究与调查》。约二十五万字，可望在一二年内出版。

（五）《捻军人物传》，这是一本专门研究捻军领袖人物传记的书，包括初期领袖，后期领袖，地方农民起义军领袖，叛徒和攻捻清将等五大部分，全书约二十万字，这部书稿也将由

有关出版社出版。

作研究工作，应该是由博返约，再由约返博，这样一个互相交替的辩证发展过程。所谓博，就是在作研究工作之前，应该有一个博览群书，广泛吸收各科知识的阶段，这就是打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集中到一种专业的一个部门里，这就是约。所谓约，就是在一点上进行突破，作深入细致的探讨，这个过程要长一些，以求取得一些成果，等到在这个部门里取得了成果，甚至已经把这个问题探讨完毕以后，然后你再慢慢地向外扩展，扩大研究领域，由狭窄的小胡同走上宽阔的柏油马路，这就是又由约返博，但这一次的博，是向更高一级的阶段发展，你就可以在一种或几种专业领域里自由地驰骋了。这一点，我做得很不够，但却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努力的，因此，在研究工作的后期，除了捻军史以外，我又写了一些太平天国史的论文，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方面着力较多，这方面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下列几种著述上：

（一）《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这是由几所高等院校的历史系教师集体编写的工具书，我参加了北洋军阀部分一些条目的编写工作，此书已于 1980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约近三十万字，它已经印刷了好几次，销数不小，适合于大中学校教师和广大青年使用。

（二）《中国近代史词典》，这也是一部共同执笔写成的著作，字数近百万，我是写捻军起义、西北回民起义、云南回民起义、贵州苗民和号军起义、天地会和两广天地会起义等部分，共有一百四十多个条目，1982 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部中型工具书被《人民日报》称为一部好书，它已销出四十万册，市场上还是供不应求，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有的机关和学校甚至集体购买，达到人手一册的地步，这种情况使我感

到很吃惊，当然也很高兴。

（三）还有一部书，初步定名为《中国近代史词汇集释》或《清代官制概述》，这是我的一部论文集，上起明清，下达现代，而仍然是以中国近代史为主，此书达七十万字，已与一家出版社谈妥，只是尚未出版。

（四）我还有一个特殊一点的作品，它既不是论文也非著作，而是一张表格，叫做《中国近代史大系表》，这是一个通俗读物，第一次就印了六万份，此表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82 年 7 月出版，次年 7 月再版。

计划编纂中的尚有两种书，一种是《捻军资料续集》，想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的基础上，再续编一种，其规模与字数可以与原来的六大册差不多等同，像《剿平捻匪方略》这部书，社会上流传已经很少，人们很难使用上它，可以编进去。像袁甲三的《端敏公奏议》，此人攻捻十年，从六科给事中一直做到漕运总督，他是由捻军战争失败的血泊中发迹的，其集中几乎全是有关捻军史料，应予编入。像邹钟的《志远堂文集》，此人与僧格林沁关系密切，集中亦有不少文字与捻军有关。像尹耕云的《心白日斋集》，此人当年在河南攻捻起家，官至布政使，集中史料亦不少，可以补《豫军纪略》之所不及，其他书籍尚多，不再枚举。还有故宫博物院的档案，其中捻军档案极多，数量甚大，可以编一部分进去，如与《方略》中相同者，留此删彼，而仍然照编入《方略》中，因为那终究是按年月日编起来的一部全面性的资料集，不必打乱其体系。一种是《捻军史译丛》，国内的研究影响着国外，国外学者在此方面的论文及著作亦不少，仅他们寄给我的论文已达二十余万字，还不包括有关著作在内，倘将其著作中有价值者编入一部分，亦是可以的。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以美籍华人邓嗣禹